

性别概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综述与展望

朱智慧

西华大学，四川 成都 610039

DOI:10.61369/HASS.2025030039

摘要： 女权运动推动性别概念从生理拓展至社会文化建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旨在批判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与翻译的束缚。西方翻译研究曾现两种思路，国内相关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后结构主义促进了性别概念的解构与范畴的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结合的产物，能极大地拓展翻译研究的视域。本文先从性别概念出发，阐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内涵与变化。然后分析在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中，从性别概念中发展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展现。最后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为未来性别概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 性别概念；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跨学科研究；发展趋势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Review and Prospect

Zhu Zhihui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Abstract : The feminist movement has expanded the concept of gender from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giving rise to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which aims to critique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gender concepts on women and translatio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once presented two lines of thought, and relevant domestic research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Post-structuralism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gender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categories. As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gender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can greatly expand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first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gender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nges of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Then it analyzes how the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developed from the concept of gender is manifested from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such as linguistics, culturology, and sociology. Finally, it looks ahead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further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with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Keywords : gender concept;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s

引言

翻译作为融合语言符号表征与跨文化交流的关键形式，其蕴含的丰富差异使其成为多个人文学科关注焦点。20世纪60至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性别概念从生理层面拓展至社会文化建构领域，女权主义者借此深入探究女性在社会、文化和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它是性别研究与翻译研究融合的结晶，“性别”在此指伴随女权运动产生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相互呼应，体现“性别的社会构建”特性。该理论挑战传统观念，为翻译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奠定基础，也为翻译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拓展开辟新视野。本文将深入探讨性别概念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内涵、变化及其跨学科应用，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一、性别概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内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女性主义”理论为主流，持性别的本质主义观点^[1]，认为生理性别决定文化性别，将性别视为个体固有特性，男女差异被看作本质性不同。80年代后结构性别理论兴起，主张性别是话语实践中构建的社会“成果”是在“异性

融合”社会性别秩序中的“展现”与“施行”^[2]，具有流动身份特征。

(Flotow)指出，过去四十年西方性别视角下翻译研究有两种路径。第一种遵循传统二元对立性别模式，预设男女界限清晰且女性从属，聚焦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关注女性在父权社会及翻译领域的偏见与不公，局限于单纯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第二种

从后结构主义解读性别身份，视性别为情境性、具有话语“施行性”的行为，受历史与社会结构影响动态呈现，认为男女二元对立体制是不平等根源。此路径将翻译视为建构性别身份平台，不过目前西方多数研究仍遵循第一种路径，第二种尚处初始阶段。

近年来，国内学者致力于在“后现代”语境中探究后殖民、性别（重点为女性）以及解构翻译研究。于“后现代”这一宏观框架里，“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核心概念，至少蕴含两层意义：“前者侧重于时间维度”，即社会发展至特定阶段，后现代性崭露头角并与现代性形成分野；后者则“聚焦于以宏大叙事的终结为显著特征的认识论立场及其引发的多元化走向”。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与后现代的交融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打破文本和性别等级关系，拆解“性别”本质主义概念，推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促使性别翻译研究涵盖宏观社会政治分析、微观文本解读及理论模型探索，范围拓展到“同性恋”和“性”领域^[3]。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曾因忽视第三世界女性差异等受批评，译者也意识到两性兼顾语言无法解决性别问题，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促使女性关注生活多元性复杂性。

在解构翻译研究中，后殖民翻译研究对“归化”和“异化”进一步“解构”。韦努蒂在传统“归化”策略上的问题，并非全盘否定，未简单对立“异化”与“归化”。尼兰贾纳的破坏性翻译表明译文或原文“早有裂痕”，与德里达解构理念相符。韦努蒂借鉴德里达思想，提出翻译借助译者诠释力量替换能指链，强调意义差异与延迟，“译者诠释的力量”侧重其对译者诠释能力的认可，类似诠释派意义观念^[4]，但韦努蒂更关注权力关系与政治因素对译者诠释影响，其翻译策略需考虑后结构主义意义的多元性差异性。女性翻译亦如此，译者不断优化策略，且与后殖民翻译一样对原文意义有潜在预设。

二、性别概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展现

（一）语言学视角下的展现

因为翻译本身与语言紧密相连，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很基础也很普遍。女性主义译者常通过词汇、句法操作实现翻译目的。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针对刘立香就薛绍徽所译《八十日环游记》展开研究，分析性别概念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得出对翻译偏离类型加以划分与统计，结果显示在微观偏离范畴内存在49处误译，涵盖诸多方面，其中句子层面的意义误译占比颇高。翻译偏离可分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两类。就无意识偏离的层面看，因为20世纪初期时中国翻译人才急缺，翻译被视作救国的一种途径，彼时社会侧重于借助翻译汲取精神养分等，薛绍徽的翻译实例对建构主义翻译观予以支撑（吕俊、侯向群，2006）。

从有意识的偏离来看，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旨在增添译作的语言美感，这突出女性译者的译作时更加抓住细

节。例如，薛绍徽对“tears coursed down Aouda's cheeks”中“check”运用“梨窝欲湿矣”这一隐喻，比起同一时期男性译者直译成“在流泪”，前者画面感更为突出，且生动地塑造出楚楚动人的形象。其二，为契合多层次读者的需求，也表明女性译者对社会状况的敏锐的洞察力。其具体表现在创作时，于宏观层面，译者将英文翻译成章回体小说形式，诸多段落进行整合，以迎合下层读者的阅读偏好。于微观层面，译者频繁将人物内心独白转换为对话，符合读者的表达习惯，并且对人物形象进行有意识的强化与修正，以满足当时上层读者的审美标准，诸如塑造儒雅的传统老爷形象、顺从的女性形象，还有较保守的爱情婚姻观念以及忠诚奴仆的等级制度等体现其中。其三与其四方面分别是传达女性译者自身受历史语境的驱动的观点。这说明其本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女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能会受限制，包括其自身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矛盾状态。从而也能够看出女性译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及对读者价值去向的判断，以及在女性译者决策过程中，都有历史因素的参与。

总之，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实践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贯穿。如女性译者或为突出性别意识，对一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词汇进行改写。或因其所处时代，对一些特定称谓用语偏好使用等。都可以能够更好地实践不同时代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挖掘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涵。

（二）文化学视角下的展现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不同文化之间的性别观念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使得文化学理论在跨文化的女性主义翻译场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访谈中，Flotow教授谈到了“文化外交”概念，以加拿大为例，其政府在将本国作家作品译介至德国时深度参与，涵盖从资助创作、翻译到宣传推广的各个环节，这全面地推动了加拿大文化走向世界，彰显了该国的“文化外交”战略^[5]。翻译在文化产品（如书籍、电影等）的传播中扮演着关键的桥梁角色，美国国务院文件也着重指出翻译对展现文化精髓（即“民族之魂”）意义重大（Cultural Diplomacy – The Linchpin of Public Diplomacy Report, 2005: 1）。此外，Flotow希望改变翻译研究和女权主义运动中过于以欧洲英语文化圈为中心的状况，鼓励关注中国、印度等更多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作家和翻译家。

从文化角度分析女性主义翻译文本的特点，能够发现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时对文本的干预往往具有政治目的。比如在译文中增减特定内容、增添注释或副文本，以及在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里补充特殊词汇表等。Flotow特别指出，女权主义翻译产生于加拿大特定的历史环境，也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期间，且源自一些特殊文本。那时加拿大女性联合起来反抗长期将女性边缘化、压抑女性的社会制度，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她觉得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在其他地区难以重现，所以，许多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学者，如果直接套用加拿大学者提出的女权主义研究框架来研究本国文化现象，这种方式并不恰当。她呼吁

各国学者基于本国社会文化背景，深入探究性别与翻译之间的内在关联^[9]。综上所述，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性别观念截然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发展侧重于女性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独立和平等权利的彰显；而在东方文化里，家庭观念在性别构建中占据极为关键的地位，女性角色更多地与家庭责任、家族荣誉等相互交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者着手从冰心、张爱玲、朱虹等女性作家及翻译家入手，深入探究国内翻译理论里的女性主义视角与意识。比如，2007年，陈吉荣于其研究中表明，与西方那种激进且追求彻底的女性主义翻译观有所不同，张爱玲秉持的是一种温和的翻译观。张爱玲并不着重强调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反而重视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展现

社会学理论对女性主义翻译是广为熟知影响的应用。由于翻译活动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社会的性别观念、权力结构等因素会对翻译产生影响。

第一，社会角色理论关注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和期望。在翻译领域，有助于分析女性译者角色定位。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学生海外传教运动时期，众多女学生出于对儿童教育和文学发展的关注，成为了晚清儿童文学译介工作中的关键力量。她们在选择作品时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取向，更为倾向于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孤儿题材的作品，其目的在于引导中国的女性和女童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同时给予孤儿鼓励^[7]。五四时期，受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巨变影响，女性形象规范改变，女性译者群体摆脱政治束缚，挑战儒家性别等级准则^[8]。

第二，权力理论主要探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运作和影响。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权力关系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在出版行业，编辑、出版商等往往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她们对于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选择和推广起着关键作用。Hannay（1985）与Krontiris（1992）对文艺复兴时期进行了研究，在这一时期，女性被刻意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无法进行创作。而翻译在当时被赋予了被动、复制甚至背叛这样的文化含义，这恰好与厌女主义所塑造的女性刻板印象相契合。Hannay（1985）与Krontiris（1992）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中指出，当时女性被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无法开展创作活动，而翻译被看作是一种被动性的活动，带有厌女主义的文化色彩。Krontiris（1992）进一步发现，像Tyler、Lanyer等女性译者，为了能让自身作品获得认可并得以发表，常常会在序言里流露出谦逊与无力之感^[9]。这一情况能够对西方女性译者使用男性名字以及中国女性译者隐身背后的现象予以阐释。

第三，后现代思潮兴起后，文化议题受重视，翻译研究独立发展，为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融合开辟了契机。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学派于北美魁北克地区兴起，将性别与意识形态确立为核心研究范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10]。90年

代初期，在受到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引发了第三次女性运动浪潮，该浪潮扩展到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促使部分女性主义学者的认识论发生了改变。以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1990年出版的理论专著《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作为起点，后结构女性主义流派逐渐形成。这一流派所提出的文化语境、主体差异、知识权力关系等全新的性别研究途径，对早期女性主义两性本质主义理论的基础进行了分解和弱化。^[11]

因此，从语言学角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揭示了语言并非中立，传统语言结构中蕴含着性别权力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词汇、句式和语法结构的选择都可能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且通过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如对阳性词汇泛化现象的修正、补充女性视角缺失的表达等，可以重塑语言中的性别平衡，使翻译文本成为挑战和改变语言性别偏见的有力工具，推动语言朝着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方向发展，也让人们认识到语言与性别在翻译语境下相互交织塑造意义的复杂关系；从文化学角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反映了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与地位的差异及其在翻译活动中的映射。它强调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性别话语实践，译者在跨越文化边界时，需要考虑源文化与目标文化中的性别文化内涵，并在翻译中进行适当的调适与协商。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女性文化，还能促进不同文化间关于性别观念的交流与碰撞，使翻译成为文化多元性与性别平等理念传播的桥梁，揭示出文化对翻译的深刻制约以及翻译对文化中性别建构的反作用。从社会学角度，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它凸显了翻译领域中女性译者的社会处境以及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分布，促使翻译界乃至整个社会重新审视女性在翻译行业中的地位与贡献^[12]。通过对翻译中性别因素的剖析，引发对社会性别分工、职业刻板印象等问题的思考，推动社会变革朝着性别平等的方向迈进，也表明翻译活动是社会大环境中性别政治的一个缩影，其发展受到社会宏观权力结构的左右，同时也可能成为撬动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的一个支点^[13]。

三、理论未来发展趋势

当下，性别翻译研究正从理论深入实践，从宏观迈向微观。其发展态势表明，未来将重点关注女性翻译研究。弗洛托指出，酷儿理论在发展进程中由于回避定义分类，致使性别分析范畴崩塌，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给女性翻译研究带来了难题。尽管性别分析范畴涵盖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内涵，其隐含的异性立场对女性主义分析具有实际价值。虽然酷儿翻译研究在不断发展，但在缺乏明确概念与范畴的状况下，难以实现根本性的进展。在性别翻译研究领域，完全舍弃“性别”概念并不可取。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自我批判中持续改进与发展，其“干预”策略也在不

断完善，以全面考虑不同国家、种族女性翻译研究的情况。因此，未来性别翻译研究很可能依旧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为重点，或者说更侧重于“女性翻译研究”^[14]。

四、结束语

未来性别概念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通过多学科视角的深度融合来推动研究的深入。它会与社会学、文化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持续深入结合。从社会学维度出发，更为精细地解析翻

译活动背后社会性别权力结构及其动态演变，探究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女性译者在复杂权力关系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基于文化学，挖掘更多不同地区、民族文化中被遮蔽的女性文化元素，促进跨文化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的多样化呈现。在文学方面，注重女性文学作品翻译时女性形象塑造与叙事手法的创新解读，使女性声音能以更多元的形式得以彰显^[15]。语言学层面也会持续探索突破传统语言性别定式的方法，构建契合女性主义理念且适应不同语言特点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 [1]Alcoff, Linda.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J]. Signs, 1988, 13(3): 405-436.
- [2]Butler, Judith. Theoretical Debates in Feminist Linguistics: Questions of Sex and Gender[A]. In Ruth Wodak(ed.), Gender and Discourse[C]. London: Sage, 1997: 21-36.
- [3]Flotow, Luise von. Gender and Sexuality[A]. In Mona Baker&Gabriela Saldanha(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nd ed[Z].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22-126.
- [4]宋美华. 后现代翻译研究：后殖民、女性、解构[J]. 中国翻译, 2020, 41(02): 16-25+187.
- [5]栾海燕, 苗菊. 翻译研究纵横：从女性主义到文化外交——路易斯·冯·弗拉德教授访谈录[J]. 中国翻译, 2015, 36(03): 70-74.
- [6]Alvira, N. B. Interviewing Luise von Flotow: A new state of the art [J]. Quaderns. R ev. trad. , 2010, 17: 283 - 292.
- [7]宋莉华. 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J]. 文学遗产, 2009, (06): 87-98.
- [8]赵启红. 五四时期中国女性译者群体的双重追求——民族大义的青年捍卫者和女性话语构建的引路人[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109-114.
- [9]李红玉. 西方性别视角下的翻译史研究综述[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9, 27(03): 85-89.
- [10]孙子尧. 多元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 40(02): 28-38+190.
- [11]刘立香. 历史语境下的翻译偏离及其接受——基于薛绍徽翻译《八十日环游记》的研究[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1(02): 196-202.
- [12]王楠, 罗艳梅. “无名困境”之名——社会心理视域下《觉醒》与《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生存困境[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6(06): 534-539.
- [13]马会娟. 加拿大学者视角下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 37(05): 131-138+160.
- [14]林吴峻民. 西施的“他者”困境——女性主义视域下两岸中国歌剧中西施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J]. 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4, 27(06): 65-75.
- [15]梅学芳. 存在女性主义叙事的创新与困境——从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谈起[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1(12): 38-42.